

于右任与晚清诗界革命思潮

胡全章

内容提要 于右任《半哭半笑楼诗草》，题材题旨上有着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倾向，诗体诗风上属于较为典型的“诗界革命体”；其问世，既是1903年兴起的革命思潮波及三秦大地的生动写照，更是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延展到西北地区的典型个案。癸卯前后，三原举人于伯循充当了“诗界革命”在关中士林的有力响应者；寓沪时期，革命党人于大胡子所办革命报章及其诗歌诗话，助推了革命思潮和革命诗潮；寓台时期，革命元老于右任仍对旧体诗抱有满腔改革热望，终其一生不负“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名号。长期以来，由于学界难见《诗草》真面目，于右任晚清时期散见于革命报章的诗歌诗话亦未受到关注，致使其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的突出业绩隐而未彰，至今仍未进入主流中国文学史书写视野。

关键词 于右任；南社；诗界革命；革命诗潮；古体新诗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和爱国诗人于右任，在主流文学史著述中是缺席的；学界讲述或探讨晚清诗界革命思潮，基本不见于氏身影；众多南社文学研究著述，也基本不提被柳亚子发展为社友的于大胡子^[1]。殊不知，这位从陕西三原走出来的辛亥元勋和革命诗人，不仅1903年前后就以震惊关中士林的诗歌创作响应了“诗界革命”，从而将诗界革命运动的阵线延展到大清帝国统治力量相对强大且士林风气沉滞的西北地区，而且在革命思潮和革命诗潮初盛年代即以报人身份躬身其役，成为革命派文人中的活跃分子。晚年流寓台湾时期，于右任仍对旧体诗抱有满腔改革热望，终其一生不负“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名号。本文拟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政府军机处档案所见甲辰抄本《半哭半笑楼诗草》（下文简称《诗草》）为中心，考察青年于右任在晚清“诗界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勾勒其在晚清革命诗潮中的突出表现，为重绘晚清诗界革命运动的地理历史版图提供新的线索与史识，为中国传统诗歌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一 于右任早年革命思想及诗学渊源

1903年，于右任刊印《诗草》时的身份，是三原新科举人于伯循。陕西三原县位于关中平原，因境内有白鹿原、孟侯原、丰原而得名，南望长安，西接咸阳，周秦汉唐乃京畿重地，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清康熙末年，陕西督学署（即学政衙门）从省会西安迁到三原县城，从而奠定其关中文化教育中心地位。晚清时期，三原宏道书院乃西北最高学府，推行新政后更合并味经、崇实两书院为宏道大学堂。庚子国变之年，西太后母子入陕，陕西中学堂师生衣冠出城迎接圣驾，在路旁跪了一个多钟头的于伯循，压抑不住满腔怒火，欲上书巡抚岑春煊除西后而行新政，因同学阻止而书未发。嗣后，因诋諆时政而狂名日著，终在甲辰春因“逆诗”案出亡上海，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

于右任早年的民族革命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关中民间代代相传的满洲人为外族的朴素的种族思想；二是朱佛光的言传身教；三是庚子岁后源自上海、日本的新书刊，尤其是梁启超主笔政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幼年随伯母寄居杨府

村外家时，一次表弟当众问长辈百家姓中何以不见县官的姓，四外祖答道：“他们是满洲人呀！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先，将中国的江山占了，所以我们的百家姓上不要他。”^[2]这件事，给了童年于右任最早的民族意识启蒙。于右任少年师事的朱佛光，在陕西提倡新学最力最彻底，“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时多绍述明末遗老精神，以励后进”；两位同窗好友喜读曾国藩、胡林翼遗集，朱先生则曰：“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3]这番话如醍醐灌顶，民族革命思想自此在这位关中学子心中生根发芽。相比之下，前两种经历印象虽然深刻，思想却较为朦胧；后一种影响，则既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西洋文明思想，又有铺天盖地的整套东洋新名词，内涵明晰且渊源有自。然而，于右任后来对前两种经历津津乐道，对后者则三缄其口。

1940年，于右任在自述中追忆早岁诗学启蒙的情形道：“在毛先生私塾时，我已开始学做古近体诗，如《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选诗》等，都曾读过，但是循文诵，终觉不生兴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学生的资格照料馆事，书架上有文文山、谢叠山诗集残本，我取而私阅，见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忽然诗兴大发，我之做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4]毛先生即塾师毛班香，设馆于三原县城东关，是一时关中名师，时在甲午前后。遵循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各种流行的古代诗歌选本，少年于右任读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味；宋末抗元英杰、爱国诗人文天祥、谢枋得的诗集残本，一读即被其扑面而来的家国兴亡之感深深吸引，产生强烈的民族思想情感共鸣，不禁诗兴大发，顿悟作诗门径。

耐人寻味的是，在其民族思想、民权思想和新诗启蒙环节，于右任自述中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导师——梁启超。当是时，流寓日本的梁启超，凭借其手中的一支健笔和报章传媒，成为晚清一代启蒙思想家和文学界革命旗手。梁启超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述及《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对国内知识界的影响时，有一句相当自信自豪的话：“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5]这一盛况，中举前后的关中士子于伯循也

是亲历者。癸卯《诗草》中《读〈李鸿章〉》一诗，印证了于氏阅读过任公《李鸿章》单行本的事实；与《李鸿章》同期在日本和上海印行的梁启超的新书刊，还有壬寅岁初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横滨新民社辑印的《清议报全编》及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考虑到癸卯岁后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二号人物梁启超分道扬镳，其后两派的政治立场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民国后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忆早岁所受进步思想和诗文风气影响时全然不提饮冰主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于右任事后的有意回避，并不能抹杀其关中求学时代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客观事实。1902年冬，黄遵宪致任公书中所言“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的情状^[6]，显然波及到了关中。史家李剑农指出：“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鸚鵡了。”^[7]辛丑年，供职于三原学署的沈钧儒，在时任陕西学政的胞叔沈卫支持下，“从上海购置印刷机器和铅字，创办三原印书馆，翻印康、梁著书，大谈维新革命”^[8]。壬寅初，陕西推行新政，改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是年，就读于宏道大学堂的于伯循的策论试卷，获“超等第二名”，奖银叁两；主考学官在批语中指出：“中《新民丛报》之毒深矣！然笔情恣肆，故是可喜。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何苦沾沾拾人牙慧？”^[9]青年于右任作文深受梁任公“新民体”影响的历史情形，被当年的陕西学政一语道破。

1900年孟春，梁启超在《清议报》“汗漫录”专栏揭橥“诗界革命”旗帜，提出“三长”纲领，诗界革命运动正式发动^[10]；其后两年间，《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充当了“诗界革命”主阵地和新派诗园地。辛丑岁暮，《清议报》停刊；随后成立的横滨新民社，迅疾辑印《清议报全编》，附

录“诗界潮音集”一卷，系从“诗文辞随录”栏诗歌中选辑，“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11]。1902年创刊《新民丛报》后，饮冰主人通过该刊“文苑”栏，继续鼓吹“诗界革命”；该栏下设“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两个二级专栏，前者充当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风向标，后者则成为新派诗的核心发表阵地。作为《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青年于右任文体文风深受“新民体”濡染，诗体诗风深受“诗界革命”和“新派诗”熏陶，也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 “诗界革命”视域下的 《半哭半笑楼诗草》

清光绪壬寅、癸卯间，就读于三原宏道大学堂的于伯循，请关中有名的摄像师董君为其照了一张正面全身散发像，人像两旁挂有优贡生胡堪所书“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楹联；癸卯岁，中举人，出任商州中学监督；同年，由姚伯麟居中介绍，经供职于泾阳味经官书局的孟益民之手，将《诗草》铅印成册，署名“铁罗汉”，内封刊有作者散发照^[12]。《诗草》甫一问世，就因其反清革命倾向，引起陕西地方官吏高度警觉。甲辰春，陕西巡抚升允责成布政使樊增祥查访此事，樊氏秘饬三原知县德锐查缴《诗草》一本，升允详加披阅，认定为“逆诗”，以“昌言革命”罪名，上奏朝廷请斥革此举人并密拿审讯^[13]。于是，一场轰动关中士林的“逆诗”案发生了；其结果，《诗草》被禁毁，正在河南省会开封参加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以追逐进士头衔为目标的全国科举会试的于右任，因提前得信而得以遁迹沪上，自此走上职业革命家之途。

癸卯年《诗草》铅印本，因遭清政府禁毁而湮没不传，是为于右任早年革命诗歌长期以来见木不见林的关键原因。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军机处档案，有一份甲寅春陕西巡抚升允上奏朝廷请斥革举人于伯循并密拿解陕的奏折，附录有“原诗”抄本；这个当年作为“罪证”被咨送朝廷的《诗草》抄本，揭开了百余年来蒙在这本“逆诗”脸上的神秘面纱，为今人了解《诗草》全貌提供了一份可靠

文献^[14]。《诗草》凡22题70首诗作。在巡抚升允眼中，这位自号铁罗汉、自比谭嗣同的新科举人的诗集，“其词意则语语革命，语语劝人为叛逆”，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昌言革命”的“逆诗”。以今人之眼光观之，集中《爱国歌》《神州少年歌》《改革诗八首》《自由歌》《蜀中狗》《从军乐》《和朱□□先生步施州狂客元韵》《兴平咏古》《杂感》等篇什，的确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其政治思想之激进，情感言辞之激烈，较诸同期上海、东京革命派知识分子发表的诗作，毫不逊色；其诗体诗风，则是当时新诗坛流行的“诗界革命体”。

卷首七律《心愿》云：“无畏多悲属善男，四围魔鬼一齐戡。愿罹苦恼航千亿，心醉英雄拜再三。万岁万岁自由死，苍天苍天顽梦酣。现身血海百无法，剩好头颅酷类谭（原注：同人谓予貌似浏阳）。”作者以烈士谭浏阳自况，展露出心醉英雄、力戡群魔、渴求自由、唤醒顽梦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怀抱、英雄情结、牺牲精神与启蒙动机。谭嗣同“仁学”思想及其牺牲一身觉天下的人格理想，深深触动了青年于右任的灵魂世界；而其阅读谭氏诗文的途径，大概率是通过横滨《清议报》。

第二首为歌行体《爱国歌》，奏响了超迈列强、民族腾飞的民族主义主旋律。在“无端欧风墨雨掀天撼地来”的全球化时代，昔日曾经“雄霸地球操左券”的东方文明古国，如今被东西洋列强“污秽神器辱种族”，“国权人权”丧失殆尽；帝国主义列强的霸凌行径，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感，触发了诗人强烈的民族反抗心理，萌生了重振大汉雄风的英雄气概。《爱国歌》所描绘的实现祖国富强的途径与蓝图——“结人心，造舆论，招国魂，立国宪，抗拉丁（原注：法、葡、班诸国），制条顿（原注：英、德、荷诸国），大陆摧倒斯拉夫（原注：俄、奥诸国），远涉重洋攻撒逊。”——是一位少有大志的关中爱国青年所做的希冀祖国凌欧驾美的绮丽的中国梦。

第三首为《神州少年歌》。诗人心目中的“神州少年”，首先要摒除“奴性”，能独立自主，有立志报国的铁石心肠和挽狂澜于既倒的铁血手腕，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这位新世纪的“神州少

年”，一方面对醉心欧化的时代新思潮表示欢迎，希冀新思想“霹雳雷霆万千钧，光明轰开政学界”；另一方面又对“国粹”思潮和“破坏”论调各有疑虑；他誓言要在“黄河流域开荆榛”，声称“我亦过渡时代一骁将”。诗人对于“神州少年”的遐思和“过渡时代一骁将”的自我定位，显然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一代名文启沃。

七律《改革诗八首》组诗，分别以血、泪、舌、胆、魂、粹、笔、铁命名立意。“血”是神州男儿之颈血和志士报国之热血，“泪”是国殇之泪和先觉者之泪眼，“舌”是广长之舌和鼓吹人权、自由之舌，“胆”是冒险精神和开新除旧气魄，“魂”是三千年铸就的国魂和民族魂，“粹”是保存华夏民族特性和独立精神的国粹，“笔”是轰醒千年顽梦、搅动革命风潮之笔，“铁”是张扬军国民主义的“赤血黑铁”。改革先驱者之流“血”，为的是“牺牲七尺造将来”；烈士“舍身殉国莫悲哀”，因为“骷髅堆起太平开”。诗人之“泪”，为“酣睡同胞唤未苏”而流，为“英雄事业剩穷途”而下。“舌”是唤醒同胞之“利器”：“人权天赋交三寸，言论自由战列强。”诗人鼓动有识之士“放胆乘时革谬讹，大刀阔斧辟支那”，号召有志之士“冒险凿开新国土，沥诚击破旧山河”，大声召唤大汉“遗魂”，并以气冲斗牛的“大和气魄”相砥砺，可谓有“胆”有“魂”。“漫逐欧风销特性，好存汉胆炼真形”，在欧风美雨“万流澎湃”之际，强调民族“独立精神”，是谓“保粹”。“笔”则径直鼓动革命风潮：“锋铤惨淡锐如刀，濡尽全球革命潮。腕力生风摧敌手，管城开府佐文豪。万钧气魄轰顽梦，一线光明绚彩毫。猛见文坛奴性破，上天下地独君高。”“铁”引入西洋故实和政治理论：“残枪仗胆俾斯马，大冶添煤达尔文。”俾斯马即铁血宰相俾斯马克（今译俾斯麦），“普自德赖赐得残枪而胜法”，故而俾斯马克有言：“天下可恃者，非公法，惟黑铁耳、赤血耳！”^[15]借晚清新知识界流行的俾斯马克名言，鼓动军国民精神，阐扬当时被视为“帝国主义之原动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造物多情磨好汉，霸才假力铸人群”。八首“改革”诗，鼓吹“赤血黑铁”思想，召唤种魂国魂民族魂，张扬冒险开拓精神，鼓吹人权自由和民

族独立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

《自由歌》《署中狗》诸篇，系作者对陕西官场有感而赋，其题旨则超越了时空。《自由歌》意在张扬言论自由和人格独立思想；歌曰：

不自由，毋宁死！俯首帖耳非男子！天赋人权有界限，蛮奴蛮奴，侵略手段横至此！言论风生真理出，心血点点争淋纸；蛮奴蛮奴，箝束言论竟如是！思想不新世无救，思想新时复诟訾；蛮奴蛮奴，压制思想胡为尔？行为牺牲造人群，出版著作输新理。我今放胆铸将来，蛮奴蛮奴，破坏行为出版有何技？要知此权我不自弃人焉夺，墨特涅故智今难使。蛮奴蛮奴，到底直作小人耳。不自由，毋宁死！争不得，势不止！蛮奴蛮奴，洗眼请看流血史。

该诗是对庸顽守旧的满人抚臣（指升允）而发，通篇指斥其为“蛮奴”，痛斥其压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专制行径，呐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时代强音。墨特涅者，“地球第一守旧党”、掌握欧洲之大权四十年的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之另一译名；在梁启超笔下，梅特涅是“专制民贼”和“阴谋诡计”的代名词^[16]。篇末“洗眼请看流血史”，则是对清廷的警告和对革命风暴的召唤。《署中狗》云：“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将批判矛头直指吞食民脂民膏的清廷官吏，同时为自己仅是一介书生而羞愧；诗人对革命已不甘于坐而论道，而向往起而行动了。

《从军乐》《书愿》诸篇，阐扬晚清新知识界流行的“文明者，购之以血”的西哲恒言，唤起军国民精神^[17]。“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烂斑照青史”，呼吁同胞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赴汤蹈火；“仰天高唱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张扬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要知公法公理皆虚言，惟有黑铁赤血直可恃”，阐扬“黑铁赤血”主义；“世界强权我强种，种强外权无由使”，讲述强种保国道理；“试看环球九万里上滴滴点点文明何由来，都是英雄以躯以血以泪以舌以胆以铁购得至”，阐发铁血购文明的普世真理；“俾斯麦，真人豪；麦坚尼，真骄子”，为国人树立欧美铁血英豪榜样；“大呼四万六千万同胞，吐气扬眉拔地倚天伐鼓撻金齐奋起”，黄钟大

吕，壮怀激烈。作者愤慨老大帝国、神州人物的老朽腐败与奴隶牛马自任现状，仰天高唱“从军乐”，大声疾呼“流血请从我辈始”，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救国之道和强国之梦，都在铁罗汉这首豪气冲天的长歌之中。联系壬寅、癸卯间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新小说》高调刊发黄遵宪《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军歌，大力倡导“从军乐”精神，以及此前《清议报》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对“祈战死”精神的褒扬，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便一目了然。

《书愿》《读〈李鸿章〉》等作，既流露出革命文人的狂放之态，又显示出思想先觉的启蒙情怀。《书愿》有云：“文明倘道头颅换，西北狂生尚有渠。”一个文明、富强、民主的新中国，需要用无数热血青年的头颅来换取，西北狂生铁罗汉甘愿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是为诗人表白的心迹。《和朱□□先生步施州狂客元韵》，在“巨蟹横行戕种类，群龙纵欲扼咽喉”的民族危亡时代，提出“英雄时势循环铸，□□才能脱羈囚”的重大命题。诗中两处“□□”，当为升允抄录时有意隐去之举；对照民国间《右任诗存》，前者为“佛光”（启沃其民族革命思想的朱先生），后者为“革命”。辛丑冬，梁启超著《李鸿章》，“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将其定位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18]。于右任《读〈李鸿章〉》诗云：“蹉跎复蹉跎，愁杀英将戈。英雄造时势，一败醒支那。”既濡染了饮冰主人对传主的敬、惜、悲之情，又点出甲午一役在唤醒中国人千年大梦方面的精神醒觉意义。

五古《杂感》四章，是《诗草》殿后之作。首章赞烈士报国，倡民族独立；二章刺清廷卖国，痛民众麻木；三章咏汤武革命，扬以暴易暴；四章摹地球战场，倡尚武精神。首章有云：“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冒险不顾身。报怨男儿事，报国烈士忧。”身为男儿，生在当下，面对祖国危亡，自当继承“民族倔强气”，“豪胆沁侠骨，结成爱国心”，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二章斥清廷将“冤鬼当恩人，朽木作国栋”，以“燕巢幕上嬉，鱼游釜中弄”刺时局，痛惜“一幅好山河，奴才定断送”。三章首句云：“伟哉汤与武，革命协天

人。”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和进步性，讥刺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叔齐为不识时务之“饿鬼”，言其“只怨干戈起，不见涂炭深；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颂扬商汤伐桀、武王灭纣乃“仗义讨民贼”。四章云：“信天行者妄，避天行者非。地球战场耳，物竞微乎微。腐败老祖国，孤军陷重围。愿歌祈战死，冲开血路飞。不然大破坏，同胞安适归？宁为国殇死，莫作人奴威。”卒章显志，鼓吹军国民主义，视其为拯救民族危亡的不二法门。

于右任《诗草》写作和刊行之际，正值梁启超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时期。梁氏提出了“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三长纲领；所谓“新意境”，乃是“欧洲之精神思想”^[19]。饮冰主人“诗界革命”指示了师法欧西的大方向，而对欧洲精神思想之具体内涵则未予限定。这一情形，既为晚清新派诗人在“革其精神”层面预留了足够的发挥余地，也为后世史家如何言说“诗界革命”留下了较大的阐释空间。在这位“中国之新民”看来，“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20]。就其倡导的诗界革命运动而言，竭力输入欧西文明思想，以供20世纪中国新诗人之诗料，是饮冰子之初心与自我定位。壬寅前后，正是梁启超革命思想高昂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21]。就新派诗创作实践而言，高吟“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原注：卢梭）孟（原注：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的梁任公^[22]，此期诗作中旗帜鲜明地表达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作为任公诗文的热心读者，于右任在《诗草》中表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同样可视为“诗界革命”在“革其精神”层面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诗界革命”视域观之，于右任《诗草》在“革其精神”层面符合输入欧西文明思想意识形态导向，在“革其形式”层面贯彻了“新语句”加“古风格”的基本原则，大体属于“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体”。集中《爱国歌》《神州少年歌》《自由歌》《从军乐》诸篇，在继承传统歌行体诗歌基础上，又以“行乎不得不可行，止乎不得不可止”的率意精神，“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的开拓意

识^[23]，在新派诗的文体试验层面有着新突破；其所表现出的不拘格套的诗体解放精神和显著的白话化、散文化趋向，使其在“革其形式”层面比“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体”走得更远，从而具备了现代诗歌的质素。

于右任《诗草》的诞生，既是“诗界革命”东风传播到风气相对保守的关中大地结出的新派诗硕果，亦是革命思潮波及三秦大地在诗坛和士林引发轰动效应的经典案例。逃亡上海后，革命报人于右任的办报活动及其见诸报章的革命诗歌，则持续为晚清革命思潮和革命诗潮推波助澜。

三 于右任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后，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蓬勃发展，新诗坛崛起了一批以排满革命为政治立场的新诗人；他们依托上海租界和日本东京创办的一批革命报刊，推出了大批以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革命思想为主旋律的革命诗歌，汇聚成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革命诗潮^[24]。癸卯冬，青年于右任“昌言革命”的《诗草》的问世，正是这场革命诗潮初盛年代在西北地区产生同声相应效果的一个历史缩影。有文学史著作将以南社诗人为主体的革命派诗歌及其掀起的“革命新诗潮”，视为“诗界革命”的“新阶段”^[25]。曾隶籍南社的革命诗人于右任，甲辰岁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亦可纳入“诗界革命”视域透视，从中可见其在“革其精神”和“革其形式”层面的坚持与省思，亦可见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与不同向度。

癸卯、甲辰间，上海《苏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革命报章，东京《湖北学生界》《汉声》《浙江潮》《江苏》等革命期刊，既是近代中国革命思潮初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刊阵地，也是晚清革命诗潮赖以形成的主要传播媒介。这些报刊要么在租界，要么在域外。而于右任那部同样具有革命性质的《诗草》，却在清政府统治力量强大的内陆腹地的陕西学政官书局公然出版；用巡抚升允的话说，“刊印多部，遍馈士林，一时士论哗然，惊为奇绝”^[26]。这不能不说是一

个奇迹。《诗草》的问世，固然有多种历史偶然性，却又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诗草》的公然刊印与流布，见证了内地进步知识青年对革命的热烈向往与大胆发声；“逆诗”案的发生及其在关中士林产生的寒蝉效应，印证了革命思想在国内传播要冒极大风险。

甲辰岁后，寓居上海和东渡日本期间，于右任以奔走革命和办报鼓吹革命而闻名海内外。余事为诗人，倒也成为东京《夏声》杂志和上海《民立报》诗歌/诗话/词话专栏重要撰稿人。1908至1909年行世的《夏声》月刊，由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创办；《夏声》诗人号召“西北健儿齐努力”^[27]，希冀“夏声一振起英杰”^[28]。于右任有《爱国歌》《将归祖国留别同人》《马关》等9首诗作见诸该刊“诗歌”栏，署名“剥果”；有《剥果词话》连载于“文艺”栏，署名“神州旧主”。他创办的《民立报》，1910年季秋问世，1913年仲秋被查封，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闻名遐迩的大型革命报纸。于右任以“骚心”“大风”等笔名发表大量诗文，包括《入关》《出关过函谷关》《安得猛士兮》等诗作，以及其所经营的“骚心丛谈”诗话专栏。《入关》有云：“眼底河山悲故国”，“啼血乾坤一杜鹃”^[29]；《出关过函谷关》有云：“书剑萧萧惊岁月，恩仇种种指河山”^[30]；《再出关》有云：“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31]。变姓出亡，誓做汤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反清革命、恢复中华为己任。其报其文其诗，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铁血主义再三致意，鼓荡着革命风潮。

1906年春，为筹办《神州日报》，于右任赴日考察新闻业并募集资金。船过马关港口，映入眼帘的是雨霁天晴后绿树、青山、红旗、蓝天、碧海景色，脑海里却映现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诗云：“苍翠湾复湾，舟行入马关。红旗翻碧海，绿树护青山。痛定宗臣血，羞开壮士颜。犹闻碑纪念，欲访兴阑珊。”^[32]《舟过马关再咏》写道：“船前山好青如黛，浪里花开白似绵。雨霁鱼吞沧海日，云开鸟断蔚蓝天。舟人指点谭遗事，竖子声骄唱凯旋。霸气三山今万丈，神舟回首总凄然。”^[33]日本海港的天然美景，大和民族的骄狂霸气，与老大帝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诗人心中压抑

不住的民族屈辱感，形成强烈反差；压在纸背的，则是革命者知耻而后勇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革命精神。《舟过神户有感》《秋夜神户车中作》亦作于这一年。“仆本恨人余忧患”，“薪胆生涯事亦成”^[34]；“匝地欢声游子泪”，“三山秋老客愁生”^[35]。在漂泊异国、恩仇歌哭的惆怅中，寄寓着诗人忧患祖国、卧薪尝胆的民族革命志节。是年秋，于右任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以长江大都督之职，并当选豫晋秦陇四省协会会长；于大胡子在革命党人中威望之高，由此不难想见。

1907年春，《神州日报》问世，于右任总经理，杨笃生总主笔，辟有“词林”“神州诗选”“神州诗话”等诗歌诗话专栏，高天梅、陈巢南、宁调元、柳亚子、傅钝根、王无生等是主要撰稿者。于右任1909年夏创办的上海《民呼日报》及其后问世的《民吁日报》，也成为南社酝酿阶段和成立初期同人依托的报刊重镇。丁未夏秋瑾遇害后，《神州日报》所刊高天梅《悲秋四章（哀鉴湖女侠也）》《路亡国亡歌》《神州八章》诸作，成为此期革命诗潮中涌现的潮头性作品。清宣统元年（1909）秋，《民吁日报》所刊高天梅《南社启》、陈巢南《南社诗文词选叙》、宁调元《南社诗序》及《南社例十八条》，则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之际的经典文献。

1910年秋，于右任在《民立报》“骚心丛谈”专栏，盛赞《离骚》为“情之至文之至者”，声言“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主张“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间，是古是我，即古即我”，断言“文坛革命之说，此不知文者之言也”。^[36]其诗学观和文体观，表现出某种“复古”意味。这一情状，与此期南社发起人高天梅在诗话中拈出的“诗文贵乎复古”口号，以及“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的论调，^[37]可说是同声相应。其背景，是革命派文士参与其中的国粹思潮的兴起；其批判锋芒，乃在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及其代表的西化（欧化）东化（东瀛文体）趋向。他在《骚心丛谈》中扬曹操《短歌行》而贬孔明《梁甫吟》，言前者“雄俊沉爽，时露霸气”，后者则“无味极矣”，^[38]显示出推崇豪杰之诗和英雄主义的一贯思想。晚清于右

任诗歌诗话，既为考察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诗界革命思潮的普遍性和革新性提供了典型案例，又为透视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提供了典型文本。

1912年春，于右任在《民立报》“骚心丛谈”栏，对出狱后的汪精卫赞勉有加，寄言“毋负同党期望”，连篇累牍地哀录其狱中诗，“以励爱国青年”^[39]；哀录革命奇人胡经武《狱内感怀》等作，湖北同盟会员居正《游滇藏诗》，“台湾名将”丘逢甲近作《谒明孝陵》四章，辛亥英烈吴禄贞遗诗十章，宋教仁《登奉天城》《安东县》等旧作，山西同盟会员景耀月近作四章，以及自己的两首哭孝陵旧作。从甲辰出亡途中口占“亡命南来哭孝陵”等句，到民国初肇口诵丘丘海“大纛鸣笳谒孝陵”之句^[40]，同样拿哭谒孝陵说事，其身份已由亡命党人变为党国元勋，不变的是其革命初心和革命诗人本色。民国初年，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骚心丛谈”专栏，与南社机关刊物《南社丛刻》一道，延续了晚清革命诗潮的尾声余响。

余 论

民国时期，身居高位的于右任，仍不失“革命诗人”本色，却声言“就诗格而论，真应该悔其少作了”^[41]。1929年出版的《右任诗存》，早年《诗草》中的诗作仅收录11题21首，刊落了11题49首。问世不久的《诗草》被禁毁，致使百余年来学界难见其庐山真面目；功成名就后悔其少作，使得今人见到的所有于右任诗集，均刊落了大部分少作；于氏回忆录中对梁启超和“诗界革命”的有意忽略，遮蔽了其青年时代重要的思想来源与诗学渊源。然而，揭开重重历史雾障后，我们终将看清：无论是于右任早年的革命诗歌创作实践，抑或其晚年倡导的诗歌创作精神和旧体诗改革方案，都与饮冰室主人的诗学主张，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乃至高度的一致性。

王懿曾指出：“诗界革命的实质，是用古典诗歌的形式表现近代启蒙思潮。它适应了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反映了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换及其感情波澜”；“诗界革命的

主要意义，是创造了与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都不同的另一种诗歌形态——‘旧体新诗’。”^[42] 鉴于“旧体”之称谓中可能隐含贵今薄古的价值判断，孙之梅将其命名为“新古体诗”^[43]。这里姑且称之为“古体新诗”。继承“诗界革命”精神的南社主流派诗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径。马君武所说的“须从旧锦翻新样”也好^[44]，柳亚子所言的“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也罢^[45]，均与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学纲领同调，强调基于传统诗歌形式的推陈出新，而非另起炉灶。抗战时期，于右任等政界大佬和文化名流发起创办《民族诗坛》《中华乐府》等诗刊，倡导以旧体诗词曲形式表现民族团结抗战的现实题材，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刊发了大量奏响时代主旋律的“古体新诗”，从某种意义上接续的正是晚清“诗界革命”的精神意绪。

寓台时期，德高望重的爱国诗人于右任，对旧体诗仍报着满腔改革的热望，对白话诗亦持赞同态度。他从精神层面强调诗歌要“发扬时代的精神”，希冀诗人“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进步”；^[46] 从形式层面主张作诗不拘平仄，以国语语音的“中华新韵”替代“平水韵”，以达化难为易、接近群众之效^[47]。这一诗学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梁启超“诗界革命”思路的承继与发展。晚清时期，饮冰主人将“诗界革命”的重心放在“革其精神”层面。五四时期，梁任公以文言、白话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预言“诗界大革命”的到来，指出作诗采用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都是好的，“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具体来说，就是“用韵不必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48] 当此之际，其所关注的重心，也随白话诗倡导者胡适转移到了“革其形式”层面。从晚清到民国，从大陆到台湾，从梁启超到于右任，从主张作诗押韵“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到提议采用国语的“中华新韵”，两位文化名流跨越时空的诗学探索与历史接力，为中华“古体新诗”对传统诗歌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有意的启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

术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柳亚子编撰的《南社社友姓氏录》，将于右任编为六五号（参见柳无忌编《南社纪略》，第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于右任未填写入社书，未参与南社雅集活动，仅有文1篇、诗8题14首见诸《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1923年12月出版）；于氏回忆文章中，未见提及南社身份。于右任隶属南社，当为柳亚子拉其入伙之举，于氏并未寄回入社书。南社文学研究界基本不提于右任，于右任选集及年谱编者也基本不提其南社身份。

[2][3][4][41] 于右任：《一个牧羊儿的自述》，《中国青年》第2卷第2期，1940年2月。

[5][2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5页，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黄遵宪集》，第5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0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8] 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第23页，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

[9] 《于右任在宏道大学堂的试卷图片》，《于右任纪念集》，陕西三原县《于右任纪念集》编辑组，第105—106页，三原，1984年。

[10] 胡全章：《1900：诗界革命运动之发端》，《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1]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册，1901年12月20日。

[12] 参见于右任《泾源故旧记（一九四四年七月）》，《于右任文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合编，第438—4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13][26] 参见《陕西巡抚升允奏革举人于伯循折》，光绪三十年三月廿一日军机处档案，转引自陈三井《故宫清档所见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3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所引该文献，均转引自该文，不再一一标出。

[14] 马忠文最早发现《半哭半笑楼诗草》甲寅抄本，并将其公之于众。参见马忠文《于右任早期反清革命的“罪证”——台北故宫军机处档案所见抄本〈半哭半笑楼诗

草》,《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下文所引《诗草》文字,均转引自该文,不再加注。

[15] 俾斯马克此言,出自《铁》诗后小注。

[16] 参见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26册,1899年9月5日。

[17] 晚清时期,最早引述这一西人恒言者,应为梁启超,时在1899年夏,其文见诸《清议报》,表述为“文明者,购之以血者也”(哀时客:《爱国论三·论民权》,《清议报》第22册,1899年7月28日)。最早援引这一西人恒言入诗者,亦为梁启超,时在1901年夏,表述为“铁血买文明”;任公《和吴济川赠行即用其韵》有云:“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东华新报》1901年5月11日);任公《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避广》有云:“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清议报》第78册,1901年5月9日)。壬寅年后,“列国文明,皆从流血购来”之说(参见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东京,1902年),已在新知识界广为流布,成为时代流行语。

[18] 饮冰室主人:《李鸿章》,第4—5页,新民丛报社1902年版。

[19]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10日。

[20] 《介绍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22] 任公:《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避广》,《清议报》第78册,1901年5月9日。

[23] [36] [38] 《骚心丛谈》,《民立报》1910年10月19日。

[24] 参见胡全章《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第261—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5] 《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第358页,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27] 金沙(邓絮):《〈夏声〉发刊祝词》,《夏声》第1号,1908年2月。

[28] 炼石女士:《祝辞》,《夏声》第1号,1908年2月。

[29] 骚心:《入关》,《民立报》,1910年12月7日。

[30] 骚心:《出关过函谷关》,《民立报》,1910年12月8日。

[31] 于右任:《再出关》,《于右任诗词选》,杨中州选注,第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2] 关西余子:《马关》,《夏声》第3号,1908年4月。刘永平编《于右任诗集》将该诗编入1909年,题为《舟入

马关》,以为是作者二次东渡日本时作(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杨中州选注《于右任诗词选》亦将该诗编入1909年,并加副标题“此‘民呼报’被封走日本时作也”(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查《夏声》第3号所刊《马关》一诗,文字与于右任诗文集所收《舟入马关》一致;《舟入马关》之名,最早出自1930年世界书局版《右任诗存》,目录中标“民国纪元前三年至民国纪元前一年”,该诗殿后。《夏声》第3期出版时间为1908年季春,于氏二次赴日时间为1909年夏。综上,该诗当为1906年春于氏首赴东瀛舟过马关之作,各种版本的于右任诗文集所标时间不确。

[33] 关西余子:《舟过马关再咏》,《夏声》第3号,1908年4月。

[34] 关西余子:《舟过神户有感》,《夏声》第3号,1908年4月。

[35] 关西余子:《秋夜神户车中作》,《夏声》第3号,1908年4月。

[37] 云间高旭钝剑:《愿无尽斋诗话》,《南社丛刻》第1集,1910年1月。

[39] 《骚心丛谈》,《民立报》1912年1月7日。

[40] 《骚心丛谈》,《民立报》1912年3月6日。

[42] 王飏:《清诗历史地位再评议》,《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3] 孙之梅:《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文史哲》2016年第2期。

[44] 桂林马和君武:《寄南社同人》,《南社丛刻》第三集,1910年底。

[45] 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民国日报》1917年4月27日。

[46] 于右任:《诗人节大会讲词(一九五五年六月)》,《于右任文选》,第468—470页。

[47] 《于右任先生诗集》下卷,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编,第80页,台北国史馆等1978年版。

[48] 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69—7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马勤勤

“光绪废立”与《老残游记》： 重释刘鹗的救国理想与文体革新

郑学

内容提要 《老残游记》创作背景是刘鹗牵入“沈荃案”中，被误认为康梁党人，故此以文学形式为其同人团体发声。它被视为“谴责小说”，并看作“故事连缀”式的松散结构，实系一种误读。该书以“如何拯救中国”为核心主题，遵循“发现问题，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展开情节，斯宾塞社会学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在小说观念上，刘鹗接受梁启超“新小说”运动的影响，同时试图在文体和思想上均达成“集大成”的姿态；即试图跨越雅俗，统合起“新小说”和传统小说的各个门类，尤其是“哲理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和“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

关键词 《老残游记》；沈荃案；刘鹗；新小说

《老残游记》是中国近代最受关注的小说名著，诚如论者所云：“中国的三四代人，凡是在学校读过书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老残游记》的。”^[1]如此盛名之下，该书的创作动机、主题思想和篇章结构，却都存在若干未解的谜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处奇景。

自从鲁迅、胡适开辟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以来，《老残游记》就一向被视作结构、主题松散的“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与其他三大清末谴责小说，实有很大差异。因为本书虽也“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2]，但它隐含着严谨的逻辑结构，且能有意识地组合“实事”与虚构情节，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

要之，刘鹗通过《老残游记》，对“如何拯救中国”这个时代难题做了完整思考，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方案。唯此一主题，只有在重新认识创作背景的基础上，方能充分揭示。

一 《老残游记》写作背后的 晚清政局

众所周知，《老残游记》对清末政事有所影射。

据刘鹗之子刘大绅追述，本书创作缘起与著名的“沈荃案”有关^[3]。该案震惊中外，政治影响重大而深远，然其案情扑朔迷离，沈荃得罪和被逮的原因异说纷纭^[4]；至于该案与《老残游记》的关系，当然更不得其详。实际上，“沈荃案”是以刘鹗为中心的洋务知识分子群体，在救国实践中遭受的一场重大挫折。由此带来的郁愤，促使他们产生向社会大众言说的愿望。而该案复杂的政治背景，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含蓄委曲的小说文体。

换言之，《老残游记》的创作背景是刘鹗牵涉到“沈荃案”中，为此他以文学形式代表其同人团体发声，剖白政治主张，这构成了小说的主题。

（一）以庚子事变为中心的创作背景

依据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中的说法，《老残游记》与晚清小说名作《邻女语》是一组兄弟作品：连梦青受“沈荃案”之累避难上海，租居于马建忠的房产，并撰写《邻女语》卖文救穷；刘鹗亦撰《老残游记》，以稿费资助连氏。虽然此说在细节上多有失真，例如蔡铁鹰考得连氏与沈荃案牵涉不深^[5]，但《邻女语》的确与《老残游记》联系紧密：二者都有意对光绪庚子（1900）前后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表态。